

Zheng Zhenduo

*Ershi Shiji
Wenhua Mingren
yu Shanghai*

二十
世
纪
文
化
名
人
与
上
海

郑振铎 狂飚 文 献 耗 中 年



陈福康 南治国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Ersbi Shiji Wenhua Mingren

yu Shanghai

Z H E N G Z H E N D U O

二十世纪

文化名人与上海

·····
狂
·····
牖
·····
文
·····
献
·····
耗
·····
中
·····
年
·····

郑振铎

陈福康 南治国 著

方全林 主 编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郑振铎：狂狷文献耗中年

方全林 主编

陈福康 南治国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 插页 8 字数 142,000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本

ISBN 7-5320-6597-9/G·6752 定价: (软精) 16.40 元



郑振铎 1934 年摄于北平

1929 年与妻女摄于上海



1948 年 50 岁生日时，在上海书斋与全家合影。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
 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
 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
 舉杯斯絕歌路難心非木
 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鄭振铎手迹

端毅吾兄

以古高麗箋湘楊氏墨書鮑參軍擬
行路難一篇呈

西諦 鮑濟

君英兄手鈔見惠殊感之今所
 藏書目無一闕於辛亥革命者豈
 足銘一憾 留錦 30 3 19

唐韻富韻華分文序目錄

1921 年秋摄于上海



1921 年 3 月摄于上海半淞园，左起：沈泽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从左至右)
前排：郭梦良、杨伟业、黄英、王统照、瞿世英、
易家钱；中排：江小鹏、白镛、许光迪、范用余、
朱希祖、蒋百里；后排：王星汉、郑振铎、宋介、
许地山、李晋、苏宗武、耿济之、孙伏园。





1949 年徐悲鸿为郑振铎作的速写

1948年与夫人高君箴摄于上海



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与中文系1937年毕业班的同学合影。

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六級全體留影





1949 年文
代会前夕，与巴
金、曹禺、靳以、
唐弢、李健吾等
摄于北海五龙亭



郑振铎与代
表团 15 位成员
合葬墓及碑文

序

方全林

20 世纪这一百年,在中国,实际上都可看作是一种文化转型期。这是一个文化上承先启后的时代。新旧共存、争斗、交替,中西碰撞、排斥、融汇,使文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目。现在,20 世纪只剩下最后一年了。在 21 世纪的门槛前,回首一番 20 世纪的文化历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21 世纪的文化建设,无疑有必要从 20 世纪的文化历程中吸取经验,也吸取教训。而上海,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在 20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由于有了上海这样一座城市,20 世纪中国文化的流变便有了不同。上海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而“20 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对于观察和思考这一问题,应该是一种十分富有趣味的视角。

由于“江海通津”的地理位置,由于上海经济的繁荣和文化市场的发达,也由于旧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格局,使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的文化人聚集之地。中国进步新文化的先驱和奠基者鲁迅、郭沫若、茅盾,中国革命音乐的开拓者聂耳、冼星海,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中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者张元济,中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杰出代表邹韬奋,中国电影的最早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家赵丹,中国现代京剧开宗立派的大师周信芳,中国现代美术巨匠刘海粟——都在上海留下了自己深深的文化足迹。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数十年间,上海为各种文化人提供了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生存条件,也为从事各种文化事业提供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环境。在 20 世纪前期的几个历史阶段,都出现过文化人从全国各地向上海汇集的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由此起步。这一运动初起时虽然以北京为中心,但由于北洋军阀的箝禁与镇压,再加上其他一些历史因素,不久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便开始向上海转移。与此同时,各方面的文化人也纷纷奔赴上海,把上海作为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1927 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的政治情势发生剧变,而上海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又成为各类文化人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最佳之地。从 1927 年到 1937 年的整整十年间,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那样活跃着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的各种文化工作者。数量众多的各种文化人常年集中在上海并积极开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遂使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化呈一时之盛。“卢沟桥事变”后,文化人汇聚上海又掀起一次高潮,那一时期,上海的抗战文化活动声势十分浩大。上海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爱国主义、不屈强暴的一种象征,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由于上海在这几个时期都成为各种文化人从事活动的舞台,就使得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与上海发生过深浅不一的关系。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留下辉煌业绩的文化名人,多数都在上海这个城市留下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脚印,多数都与上海有着或长或短的因缘。上海之所以能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几代全国最优秀的文化人士都曾经生活在上海,并在这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创造同时也相互制约的关系,上海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场所和条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生存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方式,而他们每个人的存在和文化创造活动,又直接构成上海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和文化创造活动,在总体上营造了上海的文化氛围,左右着上海的精神面貌。这是一种双向同构、相辅相成的关系。以鲁迅为例,鲁迅是 20 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做出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而鲁迅从 1927 年定居上海到

1936年辞世，都一直生活、劳作和战斗在这座城市。鲁迅文化生涯中的一半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九年间，鲁迅不但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还办刊物、出丛书，介绍外国文学和美术。在这九年里，鲁迅与上海之间决不仅仅只有一种外在的关系。上海特定的社会政治格局和文化气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鲁迅文化活动的方向和方式。最后九年的鲁迅，关心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形成怎样的思想观念，等等，都与当时上海的政治和文化状况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鲁迅的存在，也对上海当时的文化气候和文学状况产生着明显的影响。由于有了鲁迅，在那九年间，上海文化界，尤其上海文学界，多了一点正气而少了一点邪气；多了一些积极健康向上的东西，少了一些消极病态恶浊的东西。曾经有人指出，由于有了鲁迅的存在，当时上海的某些文人生活上都要检点些，惟恐丑行劣迹遭到鲁迅的嘲讽、斥责。于此也可见，鲁迅与上海文化之间，实在有着很内在的关系。

说到上海当年的文化地位，说到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上海当年所具有的那种文化精神，那种文化襟怀。文化上巨大的包容性，是这座城市能为中国现代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原因。数十年间，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被排斥的文化潮流、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可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士，

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正因为上海具有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雅量,才使得怀有不同文化理想和艺术趣味的文化人士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精神。上海这块地域则是在进入20世纪后才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的。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与众多的在这里生活和创造过的文化名人有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和创造过的文化名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过影响,而上海的文化精神又反过来影响着在这里生活和创造的各种文化人——上海特有的文化精神不只是使得这些文化名人能够在这里生活和创造,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他们怎样在这里生活和创造。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是一种相互创造的关系。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的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丹纳在

这里说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精神气候对艺术创作的左右,这种看法也同样适合于总体的文化创造。上海这座城市曾经具有的精神气候,对栖身于此的文化名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无疑起着制约作用。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的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上海这座城市精神气候的制约,研究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也就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面目。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过程而不断曲折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曾出现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出现过各种思潮,各种力量,最后历史选择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条道路。研究上海与文化名人的关系,有助于文化人、青年人进一步看清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必由之路,对塑造新一代文化人的健全人格,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起着积极的影响,因为贯穿文化名人与上海关系中的主流因素,是知识分子与党与人民与祖国在一起,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品格。同时对于上海未来的文化建设也自能提供有益的启示,比如我们能从邹韬奋的新闻生涯中总结出进步新闻工作的规律;从张元济办出版社的过程中,抽象出出版如何保持高品位,保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从周信芳舞台活动中,领悟出民族文化的保存、发展的若干做法。回眸既往世纪的文化历程,正是着眼于未来世纪上海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可以少走弯路;同时,能激发上海市民、文化人对上海的自豪和热爱,激励和增强建设上